

# 「牽制」與「策應」： 北宋應對西夏的軍事行動機制

黃子彥\*

## 摘要

本文探討北宋對西夏邊防的軍事行動機制，運用以往被忽略的「牽制」及「策應」觀察邊防上的發展。從宋仁宗朝（1022-1063）西夏進攻起，宋人即苦於在漫長邊疆上應付西夏軍，因而部分邊疆帥臣提出各路互相支援之議，不過中央並無定見，仍是各自為戰的狀態，後來朝廷及帥臣態度屢屢搖擺。經歷宋神宗朝（1067-1085）的戰爭失敗後，「牽制」及「策應」在宋哲宗朝（1085-1100）成為朝臣的共識，兩者並重，依各路地形設定行動規範，亦在實戰中獲得成果。從出土文書可見，直至北宋末年的陝西仍有相關機制，直到陝西完全失陷於金人為止。

關鍵詞：北宋、牽制、策應、西夏、邊防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 一、前言

自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 在位）時，西夏崛起，成為繼遼以來威脅最大的邊患，直到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位）時金人南下為止。關於北宋對外關係及制度變化，前人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sup>1</sup>面對西夏在軍事上的挑戰，以及遼對宋的潛在威脅，北宋不敢輕忽，於接壤的國疆沿邊屯駐重兵，修築防禦工事。<sup>2</sup>從宋仁宗到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 在位）之間，國內軍事制度與組織方面作了改革，原本兵將分離的「更戍法」漸被「置將法」所取代，新建的「將」成為軍隊訓練、作戰單位。<sup>3</sup>本來分別由都部署及知州指揮的部隊，在安撫使等職下得以結合，此後各「路」的部隊由安撫使、經略安撫使所率領。仁宗寶元元年（1038）於陝西設立安撫使一職，由知州兼任，掌管其管轄範圍中的兵民之政，軍事事務可得便宜裁斷之權。<sup>4</sup>

---

<sup>1</sup>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初版於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sup>2</sup> 關於對遼的防禦工事及配置，參見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3（臺北，1990.9），頁722-725；Peter Lorge, “The Great Ditch of China and the Song-Liao Border,” in *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 War, Bord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 ed. Don J. Wyat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59-74. 關於對夏關係與堡寨，參見羅球慶，〈宋夏戰爭中的蕃兵與堡寨〉，《崇基學報》，6：2（香港，1967.5），頁223-243；程龍，《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sup>3</sup> 參見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頁114-142；雷家聖，〈北宋禁軍編制的演變與「置將法」的實施〉，《史學彙刊》，34（臺北，2015.12），頁101-122。

<sup>4</sup> 安撫使、經略安撫使多是文官出任，武官往往只能擔任副使之職。除了安撫使以外，還有制置使掌邊疆軍旅之事，經略安撫使掌一路兵民及對外事務。

機制（mechanism）一詞，意指一個機械或類比為機械的事物，不論是物質抑是非物質的，其結構或各部份互相適應，<sup>5</sup>本文借用來表達北宋如何運用邊疆各路以「牽制」與「策應」行動來達成軍事上的效果。為了應付對外戰爭，內部的制度與軍事指揮都要因應環境作變動。從上文所述可見，前人對北宋制度與組織的研究多是靜態方面，因此本文以北宋的對外軍事行動「牽制」和「策應」為主題，以對夏戰爭為對象，探討北宋面對外敵的作戰方式與應對機制，以及其因應情況變化的討論和過程，即是動態上的變化。

北宋對夏戰爭中，最為人熟悉的行動應是「進築」和「淺攻」。<sup>6</sup>前者代表在控制範圍以外建築堡寨，以利日後的行動，是長遠的規劃。進築首次出現於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由知延州范仲淹（989-1052）提出：

---

以宋夏邊疆地區為例子，太原府、延安府、慶州、渭州、熙州、秦州的知州多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參見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61，〈職官考十五〉，頁1850-1851；同書，卷62，〈職官考十六〉，頁1682；同書，卷63，〈職官考十七〉，頁1896-1897；羅球慶，〈北宋兵制研究〉，《新亞學報》，3：1（香港，1957.8），頁218-223；Michael C. McGrath, "Military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1126)" (PhD thesis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2), pp. 189-247.

<sup>5</sup> 原文為 "The structure, or mutual adaptation of parts, in a machine or anything comparable to a machine, whether material or immaterial." 參見 J. A. Simpson, Edmund S. C. Weiner ed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sup>nd</sup>.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36.

<sup>6</sup> 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頁219-223；吳天墀，《西夏史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68-70；曾瑞龍，〈從妥協退讓到領土擴張：論宋哲宗朝對夏政策的轉變及其兼容的軍事戰略〉，《臺大歷史學報》，28（臺北，2001.12），頁109-113；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56-57、73-75。

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卻是遠圖。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竣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并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三路俱出無異。<sup>7</sup>

當時宋軍對橫山的控制力還尚薄弱，范仲淹希望能在控制範圍外的有利地形上建築堡寨，以創造有利的形勢。

「淺攻」字面上的意思是輕兵進攻，南宋末年的家鉉翁（1213-1297）言：「本謂輕兵淺攻為侵，全師深入為伐」。<sup>8</sup>宋代首位記載淺攻者應為仁宗朝的尹洙（1001-1047），尹洙在李元昊（1003-1048，1038-1048 在位為夏景宗）入侵陝西時為陝西宣撫使判官，有關禦夏的書信甚多。他指出韓琦（1008-1075）、夏竦（985-1051）策劃攻、守二策的攻策之中包括淺攻，是討擊沿邊族帳的意思。<sup>9</sup>宋英宗（1032-1067，1063-1067 在位）治平四年（1067），薛向獻淺攻之策，「諸路分據地勢，犄角進兵，聲援相及，若首應尾，使其備東北，則擊西南，狃以歲月，勞於奔命，所以罷其敵也」。<sup>10</sup>後來宋哲宗（1077-1100，1085-1100 在位）時環慶帥臣章窳（1027-1102）建議「淺攻」的上奏十分詳細，朝廷最後採納其「掩

<sup>7</sup> 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後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130，慶曆元年正月戊午條，頁3081。

<sup>8</sup> 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8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5，〈秦師伐晉〉，頁281。

<sup>9</sup>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178冊，據上海涵芬樓影印春岑閣舊鈔本重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20，〈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牽制賊勢事〉，頁105。

<sup>10</sup> 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據《宛委別藏》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83，〈种諤城綏州〉，頁2696。

其不備，討擊鈔掠」、「一路之師既歸，少使休養，他路乘間伺隙，更迭復出」的意見，成為扭轉宋夏關係的關鍵。<sup>11</sup>

至於「牽制」與「策應」，此二詞在北宋後期經常同時出現，前人研究並未清楚分別兩者。<sup>12</sup>「牽制」一詞用途較廣，試舉數例，如宋真宗（968-1022，997-1022 在位）時，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965-1006）論到將帥之事，「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這裡表達的是將領受到掣肘，未能如意行事。<sup>13</sup>高麗因被遼攻擊，遣使至宋，「乞王師屯境上，為之牽制」。<sup>14</sup>宋遼戰爭之際，宰相寇準（961-1023）計畫在遼軍南下時，魏能一軍可以「傍城牽制，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sup>15</sup>以上所說的牽制與今天的用法相當，是指某對象受制於某些人、事、物，不得自由行動，或行動時有所顧忌的意思。後來李元昊攻擊陝西，知延州范雍（981-1046）認為涇原路的優勢除了有老將以外，「兼有西蕃瞎躡牽制，賊眾（指西夏人）不敢輒進」；及後提議在夏人進攻時，「如賊入一路，即令諸路舉兵以牽制之」。<sup>16</sup>到底他說的「牽

<sup>11</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69，元祐七年正月壬子條，頁11212。

<sup>12</sup> 李華瑞認為「牽制策應」與「淺攻撓耕」實行於不同時間，但事實上它們在哲宗一朝內是同時存在的，並無先後之分。曾瑞龍指「在戰役層次上，（彈性防禦）重點有兩個：一是遮斷，二是淺攻」、「在防禦方面……根據對方的主要方向，來收縮兵力和策動遮斷，也大體能做到外線反擊。一路受攻，各路同時牽制。」這裡將淺攻與牽制混淆，而將策應視為牽制。參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156-170；曾瑞龍，〈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收入氏著，《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49-52。

<sup>13</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4，咸平二年閏三月庚寅條，頁937。

<sup>14</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5，咸平二年八月丙戌條，頁1211。

<sup>15</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7，景德元年閏九月癸酉條，頁1266-1267。

<sup>16</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5，寶元二年閏十二月，頁2954-2955。

制」內涵為何？據范雍的說法，朝廷採納他的意見，後來西夏人進攻，環慶一路出兵，擊破夏人在後橋的據點。因此可以知道，「牽制」之意是要使敵人有後顧之憂，而宋人在軍事上實際運用，往往是於敵人來犯時，發動軍隊出擊敵人後方，使之有所顧慮，放棄深入。至於會否有「牽制」之意，而史料中未有道明「牽制」二字？這的確存在，如《宋史·趙隆傳》載「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即是如此。<sup>17</sup>

由於行動方式相近，「牽制」與「淺攻」可能會被混淆，但從上文所述來看，可見兩者實為不同。前者屬於被動，是在敵人入侵時的反應動作，而後者屬於主動，意在打擊西夏邊陲的經濟。

「策應」方面也可以舉例說明，如真宗時「原州熟戶裴天下等言，移湖等帳附李繼遷，請帥族兵掩擊之，來求策應」。<sup>18</sup>西涼府都首領潘囉支(?-1004)遣使希望宋人可以配合進攻賀蘭山，真宗「詔涇原路部署陳興等俟囉支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策應」。<sup>19</sup>大中祥符八年(1015)有詔「鎮寨都監、監押、寨主，知蕃兵侵寇熟戶，即時部兵策應，違者重行朝典」。<sup>20</sup>可見「策應」比「牽制」更多是屬於軍事用語，大多是用於軍事行動上，其內涵是支援某地的友軍作戰之意。

再以一個北宋後期的例子來看，紹聖四年(1097)樞密院推演如何應對西夏入侵：

---

<sup>17</sup>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350，〈趙隆傳〉，頁11090。

<sup>18</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4，咸平六年三月乙卯條，頁1186。

<sup>1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6，景德元年六月丁丑條，頁1240。

<sup>20</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乙卯條，頁1921。

如併兵寇犯一路，其鄰路除合行策應外，如可以側近去處，據險設伏，出奇掩擊，或扼其歸路，或旁出間道，邀擊輜車，或廣張旗幟，多設疑兵，使賊顧望，難於進退。因其留滯困怠，可以追粘尾擊。或乘其退散之際，痛行掩殺，即選委統制兵將帶領得力將佐及精銳人馬前去。其牽制路分若去被寇路分不遠，亦依此施行。或道路隔邈，難以前去，即精加控討，發兵入界掩擊團聚兵馬，或討蕩賊界諸州、或監軍司、或郊野住坐部落族帳。或於本路有合展拓城寨，乘時間隙，便行進築。<sup>21</sup>

樞密院指示鄰路「策應」部隊的目標在支援被入侵的路分，以及協助打擊入侵者，距離較近的「牽制」部隊可乘機轉以敵軍為目標，距離較遠者則可進攻，進入西夏境內討蕩據點。由此更能顯示「牽制」和「策應」的內涵有所不同。

## 二、仁宗朝的挫敗與「牽制」、「策應」的建議

縱覽仁宗朝的宋夏戰爭，可以發現朝議的理想戰略與實際狀況往往有所差別。宋朝雖然在對夏戰爭中連連失利，陝西千瘡百孔，宋朝對西夏的態度及戰略都有著轉變，最重要的是宋人對堡寨、「牽制」與「策應」行動起了注意。

西夏景宗李元昊繼承為党項之主後，開始挑戰宋朝。景祐元年（1034）開始攻擊宋人，在寶元年間（1038-1039）大舉進攻。宋夏之間多是山區，地形複雜，且邊疆地帶橫向分佈，宋人說長「二千餘里」，不易防守（可參考圖 1 的示意，按宋仁宗時未成立熙河路）。當時宋人在陝西的部署並不完善，知延州范雍上奏

<sup>21</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88，紹聖四年五月壬申條，頁11586。

鄜延一路的情況：

今東路自承平至安遠，約二百里，自長寧至承平百餘里，自長寧至黃河一百里，中間空闊，並無城寨。舊分三道，兵馬控扼，每處約三千人正軍，每軍須得閤門祇候、諸司使副一兩人，指使、班行四五人，前後排布。緣臨陣鬪敵，事不可測，緩急更須藉人。<sup>22</sup>

由於通道較多，鄜延的部隊必須要分兵，難以集中力量。而每處才三千人，無論將官或是士卒皆不足，須要臨時調動人手。所以他主張：

如賊入一路，即令諸路舉兵以牽制之。朝廷已降處分，及賊奔衝之時，移牒諸路，惟環慶洮河東路出兵深入，因得破賊後橋。今聞上言者以為引惹生事，乞不酬賞。是欲坐觀此路被害，更無首尾相救之勢，萬一敗事，臣雖盡死節，已誤國家之寄。望察不當職臣僚上言之弊，更嚴下約束，如諸路因牽制而獲功者，即明行軍賞。<sup>23</sup>

在有能將帥及士兵皆缺，據點之間距離又遠的情況下，范雍希望可以在敵軍入侵時，其他路分舉兵「牽制」敵人，打擊西夏人據點，但不久後的後橋之戰卻被認為是生事，所以請求朝廷賞賜之。<sup>24</sup>

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軍果然進攻鄜延路，大敗宋軍於

<sup>22</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5，寶元二年閏十二月，頁2954。

<sup>23</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5，寶元二年閏十二月，頁2955。

<sup>24</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5，寶元二年閏十二月，頁2953-2955。

三川口，仁宗調整中樞及各路的人事。知制誥韓琦為陝西安撫使，<sup>25</sup>韓琦上任後不久即上奏，建議加強鄜延路的防禦：

況鄜延路一帶，係昊賊納款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便於巢穴。臣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時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為熟戶防家，於國實有何益？<sup>26</sup>

他認為可減堡寨，以改變備多力分的現象，另外主張屯兵鄜州作延州的支援，並以相距西夏腹地較遠的秦鳳部隊「策應」他路。<sup>27</sup>應韓琦之請，知越州范仲淹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sup>28</sup>范仲淹明白宋軍力量不足，未能在戰場上擊敗西夏軍，主張「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sup>29</sup>但是純粹的清野不足以應付。

朝廷這時在意的不是防守，而是反攻。為報復西夏的入侵，宋朝開始嘗試掌握主動，鄜延、環慶宋軍多次主動打擊西夏。<sup>30</sup>

<sup>25</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6，康定元年二月壬辰條，頁2973-2974。

<sup>26</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6，康定元年三月，頁2995-2996。

<sup>27</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6，康定元年三月，頁2995-2996。

<sup>28</sup> 范仲淹先被任命為知永興軍，後才陝西都轉運使，再改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參見宋·李燾，《長編》，卷126，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條，頁2988；同書，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壬子條，頁3009；同書，卷127，康定元年五月己卯條，頁3013-3014。

<sup>2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7，康定元年五月甲戌條，頁3012-3013。

<sup>30</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庚申條，頁3039；同書，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庚午條，頁3043；同書，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條，頁3044；同書，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午條，頁3045；同書，卷129，康定元年

之前朝廷以出界者為「生事」，現在改為鼓勵出擊，如破西夏白豹城的環慶副都部署任福（981-1041）兼任鄜延副都部署，又被賞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sup>31</sup>作戰不力、怯懦者則受到懲罰，甚至有因而被斬首者。<sup>32</sup>

康定元年底，在數次成功的攻勢之下，知永興軍夏竦與韓琦計劃攻守策，其中攻策主張對西夏作攻勢，引起朝廷熱烈的討論，仁宗及兩府大臣多認同攻策，決定在明年（1041）正月以涇原、鄜延兩路進兵。<sup>33</sup>范仲淹不認同大舉進攻的戰略，認為這未能據要害之地，退兵之後，塞外的族帳又回到原處，大軍出征殺戮只會增加各地怨恨，萬一失敗會被輕視。不如佔據宋夏之間的山區，作持久之計。這得到朝廷的採納。<sup>34</sup>范仲淹在其後再度闡述：

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卻是遠圖。  
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  
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並

---

十月乙酉條，頁3051。

<sup>31</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9，康定元年十月丙申條，頁3052。

<sup>32</sup> 如鎮戎軍作戰不力者多被懲戒，參見宋·李燾，《長編》，卷129，康定元年十月己丑條，頁3051；同書，卷129，康定元年十月丁酉條，頁3052；同書，卷129，康定元年十一月壬子朔條，頁3054；同書，卷129，康定元年十一月癸丑條，頁3054；同書，卷129，康定元年十一月戊辰條，頁3051。

<sup>33</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條，頁3062。曾瑞龍認為這是宋初速戰速決軍事信念的延續，參見 Shui-lung Tseng,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 A.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from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7), p. 261.

<sup>34</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0，慶曆元年正月丁巳條，頁3079-3081。

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三路俱出無異。<sup>35</sup>

後來，范仲淹再次說明他的計畫：

乞斷自聖意，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令臣督諸將於二月半出兵，先修復廢寨，不須大段軍需，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興功，候有倫序，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於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強者可襲，弱者恩附。此亦拓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散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戶蕃部並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sup>36</sup>

他接續之前的建議，不必以大軍作攻勢，可以在山區築堡寨，以牽制西夏在東方的部隊，使之不能集中兵力。這樣不用耗費大量糧食，後勤可以確保供應，同時漸漸吞併蕃部，強者襲、弱者附，取得橫山的控制權，風險較低。不過，范仲淹雖然反對出兵，但他職責所在的只是鄜延路一帶，因此在論述上他對於涇原、環慶出兵，其實稍有讓步，後來只論鄜延築寨之事。在整體的論述上，范仲淹並無多著墨於細節，他先是從宋朝朝廷的戰略

<sup>35</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0，慶曆元年正月戊午條，頁3081。

<sup>36</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0，慶曆元年正月戊午條，頁3081-3082。據李燾的說明，范仲淹「正月二十五日初奏，二月八日又奏，二月二十四日並二十五日又奏，三月七日又奏，四月五日又奏，凡六奏」，以上的奏議應是正月二十五日及二月八日之奏。

角度分析，認為不利作攻勢，主張作縱深較低的持久戰，再縮小到鄜延路的層面，建議本路可以出兵修復、建築堡寨。<sup>37</sup>

到了預定出兵的日期，李元昊向宋議和，然而宋人仍未有共識。<sup>38</sup>范仲淹的「牽制」之議並無被接納。支持政策的夏竦認為范仲淹前後不一，沒有看清楚其計畫，他指范仲淹其實不是反對攻勢，只是在時機不同而已，所以作一彈性的調整，認為鄜延兵可至綏州，伺機再深入。<sup>39</sup>夏竦再論，指范仲淹「固執前奏，未肯出師」，「以牽制為名，盤旋境上」，而李元昊求和若非恐懼，就是緩兵之計，所以希望仁宗及兩府可以令范仲淹同意出師，先發制人。<sup>40</sup>面對種種的質疑，韓琦指若用守策，一方面除了分散兵力，如再失堡寨必會打擊宋軍士氣，而且防守眾多堡寨，經費不少，同時影響民生。現在春季已快過半，用兵時機不再理想，「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敕兵馬，俟及秋初，若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克日降旨，則庶事易辦，便可進兵」，所以決定是否繼續用政策的責任，就到兩府手中了。<sup>41</sup>

就在士大夫依然各持己見的時候，宋軍在好水川戰敗，使朝廷對大舉進攻的建議稍有卻步。<sup>42</sup>范仲淹並沒有機會在鄜延路把

---

<sup>37</sup> 更多對范仲淹戰略的討論參見 Paul Jakov Smith, "A Crisis in the Literati State: The Sino-Tangut War and the Qingli-Era Reforms of Fan Zhongyan, 1040-1045,"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5 (January, 2015), pp. 85-90.

<sup>38</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0，慶曆元年正月條，頁3085。

<sup>3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0，慶曆元年正月戊辰條，頁3084。

<sup>40</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1，慶曆元年二月辛巳條，頁3093-3094。

<sup>41</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1，慶曆元年二月丙戌條，頁3098-3100。

<sup>42</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1，慶曆元年二月己丑條，頁3100-3102；宋·司馬光著，鄧廣銘、張希清等點校，《涑水記聞》（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第10種，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12，頁225-226；宋·尹洙，

他的計劃完全實行，因為在不久後，就因擅自與李元昊通信，被降職調任，輾轉再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鄜延路帥一職由陝西都轉運使龐籍（988-1063）代替。<sup>43</sup>

好水川之戰再次挫敗宋人想以會戰打擊西夏的構想，這使得各路互相應援的意見紛紛出現，但是仁宗與朝廷的態度已轉為不願冒險，只願批准各路互援的「策應」，出塞「牽制」、「打族」的成效也被懷疑。<sup>44</sup>范仲淹分析環慶一帶的形勢，認為當西夏軍攻東方的麟、府時，可以出兵攻西夏要害、和市之處，環慶可攻折羌會，鄜延可攻金湯、白豹，是為「牽制」。<sup>45</sup>范仲淹的建議裡，「牽制」即等同入界，這種並非前往戰地支援的建議被認為「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籌」，仁宗指范仲淹應該要理解鄰路互援的重要性。范仲淹再次申明說法，指取得金湯、白豹兩地並無不利，慶州境內合水、華池等寨的資源又可供屯泊之用，不會有「守備之煩」。講到朝廷不同意的「牽制」，他認為「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

---

《河南先生文集》，卷3，〈憫忠〉，頁4b-5b；元·脫脫等撰，《宋史》，卷325，〈任福傳〉，頁10506-10507。

<sup>43</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1，慶曆元年四月壬午條，頁3114；同書，卷131，慶曆元年四月癸未條，頁3114；同書，卷132，慶曆元年五月壬申條，頁3129。

<sup>44</sup> 如田況指「屢見打族非利，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瓦城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譜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署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八人，斬賊者，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守備，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以破奸謀。」參見宋·李燾，《長編》，卷132，慶曆元年五月甲戌條，頁3129-3138。

<sup>45</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4，慶曆元年十月癸卯條，頁3195。金湯及白豹二城的研究可見張多勇，〈西夏金湯、白豹古城考察研究〉，收入劉文戈、馬嘯主編，《范仲淹與慶陽：紀念范仲淹知慶州97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頁332-342。

氣」，太遠的地方根本不能及時增援，「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以戰術上的攻，配合戰略上的守，才不會成為被動的防禦。<sup>46</sup>知延州龐籍大體上和議，指西夏軍「利於速戰，短於攻城」，「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sup>47</sup>

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1003-1058）主張勘查地形，倚地利布署。他指涇原路山川平易，少有阻隔之地，且蕃部較傾向西夏人，所以要重兵駐於渭州、涇州。環慶路受較少威脅，蕃部親宋且得力，但要留意環、慶兩州的連結。秦鳳路與西夏相距較遠，但是兵少，須增兵扼險守備。鄜延路主要有三條對夏道路，蕃部族帳不多，有六萬人分成六將，足以禦敵，若要更保險些，可以點土兵作援軍。論到作戰的方式，萬一各路的險要之處被突破，則可在西夏軍回程之時伏擊之。在「策應」方面，需命令諸路在接收西夏軍入侵消息時立刻出動。<sup>48</sup>

知鄜州張亢（998-1061）認為關鍵不在兵力，是應敵的指揮有問題，當西夏軍攻打涇原路，卻命令遙遠的鄜延路「策應」，西夏軍在援軍未到時已經撤退。若是純粹增兵，不但增加軍費，還影響軍隊節制。不過張亢上奏後沒有得到回復。<sup>49</sup>

從仁宗朝的發展來看，「牽制」和「策應」都是出戰爭的壓力，因應戰爭而生的軍事行動，由邊疆帥臣所提出。其出現的原因是一路難以獨自對抗西夏傾國之力，必須要結合其他路的兵力。官員之間對這兩項行動的意見不一，實際的作為也不多，而

<sup>46</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5，慶曆二年正月壬戌條，頁3216-3218。

<sup>47</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5，慶曆二年二月辛巳條，頁3222。

<sup>48</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2，慶曆元年六月己亥條，頁3140-3145。

<sup>4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132，慶曆元年七月己酉條，頁3146-3149。

且無論是皇帝、兩府官員對作戰手段都沒有明確意見，因此沒有對戰爭造成重大的效果，亦因為與西夏議和而擱置。不過這些討論卻定下後來北宋「牽制」和「策應」接續發展的基礎。

### 三、英宗、神宗朝的搖擺不定

仁宗朝的「牽制」和「策應」都是由邊疆的帥臣所建議，在英宗、神宗朝，開始成為朝廷下詔的命令，證明朝廷開始重視之。雖然兩者的功能開始被採納，但是如何規範仍是意見不一，有主張「牽制」者，有主張「策應」者，對路分權限的大小眾說紛歧，以致朝廷政令多變。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有詔陝西四路在西夏軍入侵時，一方面安排熟戶、邊疆弓手的老小避難，另一方面動員土兵應敵。鄰路分析情勢，遣兵作「策應」，支援遭襲擊的所在地，「即不得以策應為名，只於側邊觀望」。若西夏軍人數眾多前往攻城，則需要帥司向他路報告，諸路「領兵入西界牽制」。<sup>50</sup>雖有詔令，但是英宗、神宗朝皆不見「牽制」的實施。

治平三年（1066），夏毅宗李諒祚（1047-1068，1048-1068在位）率兵攻慶州大順城，環慶軍拒而不戰，涇原軍前來「策應」，但到達戰場前西夏軍已經撤離。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涇原路經略使蔡挺（1014-1079）以大順城之戰作例子，對「策應」的實踐提出意見。他指雖然各路早有安排「策應」兵馬駐紮鄰路，但是「見鄰路舉烽關報，未得起發，徑申本路」的規定，會使出兵「策應」的路分錯過發兵時機。神宗遂修正規範，「策應」將官可在

<sup>50</sup> 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5冊，〈兵二八·備邊二〉，頁9209。

確定西夏軍進攻鄴路時出動，不必等候經略司的命令。<sup>51</sup>這樣一來，各路互相支援，不須只用一路的兵力來對抗傾力進攻的西夏軍。「策應」的部隊還可以成為拓邊的預備隊，如涇原路在緊急時可「策應」熙河路的軍事行動。<sup>52</sup>

宋神宗銳意進攻西夏，希望能滅亡西夏，從而「包制」遼。在面對西夏威脅時，仍然要設置防備。熙寧三年（1070）九月，神宗以參知政事韓絳（1005-1088）為陝西路宣撫使，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1027-1097）為宣撫判官，主理陝西兵、民之事。在出發赴任之前，韓、呂二人向神宗建議「攻、守二議」，即是他們的對夏戰略。其大意是精兵政策和諸路協同，以重金募奇兵出擊，在西夏軍進攻後撤回時打擊之，「嚴為守備，賊至則堅壁清野，退則出奇兵邀擊，或乘虛攻略以為牽制，速報鄴路出兵救援以解敵圍」，如此則「牽制」及「策應」皆備。

呂大防分析宋夏雙方的優劣之處，西夏軍「星居鳥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動員時間較長，而宋軍是「一二萬之眾旦夕可集者」，但是「舉一路將兵，除防守外不滿二萬」，所以在仁宗時，當西夏軍「專向一路」，以多擊少，而宋軍則是以其所短擊西夏軍之所長。因此以七將蕃漢軍馬併出，「以行擾擊牽制之策」，收到西夏軍即將入侵的消息後，「伺其未集，便行擾擊；彼若聚兵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使敵防救不暇」。<sup>53</sup>

---

<sup>51</sup> 蔡挺為時任涇原經略安撫使，參見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504；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5冊，〈兵二八·備邊二〉，頁9210-9211。

<sup>52</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39，熙寧五年十月丙申條，頁5818；同書，卷240，熙寧五年十一月丙辰條，頁5826。

<sup>53</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15，熙寧三年九月甲辰條，頁5241-5242。

韓絳、呂大防新編的七軍相繼出擊，有所斬獲。《三朝名臣言行錄》載「破敵者十七，戰皆捷」。<sup>54</sup>再考史書所記七將的戰果，「鄜延种諤、燕達；涇原周永清、王寧、劉慶、种古；環慶种診、任懷政；秦鳳向寶、劉舜卿；麟府王文郁、許咸吉、曹偃、張居等十四頭項兵馬，各曾出界遇賊，並有斬獲」，<sup>55</sup>知原州种古「羌人犯塞，古禦之，遂城熙寧砦鎮戎之北」，又與知環州种診破羌人於折羌會；<sup>56</sup>鄜延都監燕達（1030-1088）「數率師深入以撓敵謀，凡九戰」，<sup>57</sup>因此應是確有其事。

熙寧四年（1071）正月，掌陝西、河東兵、民之政的韓絳為了連接鄜延和河東之間的交通，出兵鄜延以北，先後築撫寧、囉兀兩堡寨。當西夏軍圍攻囉兀，韓絳命環慶兵出塞「牽制」時，環慶發生兵變，導致戰役失敗，韓絳因而罷政。<sup>58</sup>河東帥臣呂公弼（1007-1073）更指囉兀之敗代表韓絳引以為傲的「牽制」其實無效。<sup>59</sup>

「牽制」與「策應」的規定程度到底該如何拿捏？宋人到此

---

<sup>54</sup> 此句是伊藤一馬引自《三朝名臣言行錄》，參見伊藤一馬，田由甲譯，〈北宋陝西地區形勢與將兵制的建立〉，收入鄧小南主編，《過程·空間：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424。

<sup>55</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庚寅條，頁5373。

<sup>56</sup> 宋·王稱，《東都事略》（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第4種，景印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刊本，臺北：中央圖書館，1991），卷61，〈种世衡附种古傳〉，頁924；元·脫脫等撰，《宋史》，卷335，〈种世衡附种古傳〉，頁10744-10745。

<sup>57</sup>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84，〈燕達傳〉，頁1282-1283。

<sup>58</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19，熙寧四年正月戊子條，頁5320；同書，卷219，熙寧四年正月己丑條，頁5320-5321；同書，卷220，熙寧四年二月庚辰條，頁5361-5362；曾瑞龍，《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0），頁150-152。

<sup>5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戌條，頁5379-5380。

時為止還沒有答案，若規範太鬆，則形同虛設，或會助長將官戰時觀望之態；若規範得太嚴格，又不利於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局，且容易被敵人看破手腳。神宗強調部隊的一致性，在「策應」方面亦如是。

熙寧四年七月，朝廷頒布陝西四路防秋之法，希望能強化各路對入侵的應對。此策是預計西夏軍作深入攻勢時，調動部隊應對的方案，其實就是「策應」的性質。除了規定要出擊截斷西夏軍退路的部隊以外，其他據點以內的部隊都「不責以戰」，整個計畫的目的是「以固根柢」。以涇原路作例子：

涇原路。賊若寇原州靖安、綏寧，則原州兵不出，以萬人守平安，控南路，趨渭州；以鎮戎軍將兵、弓箭手由乾興徑入靖安，斷賊歸路。賊若寇鎮戎軍，即以萬人并本將軍馬駐本軍，以弓箭手五千人為遊兵，別以五千人守瓦亭，更移靜邊寨所駐正兵、弓箭手取三川路合勢。賊若寇德順軍，即別以萬人屯守靜邊，兼以弓箭手五千人為遊兵，逐便擾擊，移瓦亭五千人入本軍。賊若自武延、易臧川而來，即移靜邊兵駐隆德，扼賊歸路；鎮戎軍第四將及弓箭手由得勝路會合，於諸城寨只留守兵，不責以戰；渭州只以一將兼義勇防守，其餘兵並屯瓦亭，以固根柢，左右相援，合勢掩殺。<sup>60</sup>

為了使部隊在緊急作戰時有大概的方針，朝廷預測西夏軍的行進路線，若西夏軍到某地，則宋軍移動到某點，策中更規定部隊的人數、「將」的行軍路線、目標地點。在這計畫之中，特點在於

---

<sup>60</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25，熙寧四年七月條，頁5493-5495。

掩殺西夏軍的前提，是「以固根柢」，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才進行打擊。

除了各路支援已路前線的方案以外，宋朝似乎還在熙寧年間後期對「策應」法作更仔細的規定。據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呂惠卿（1032-1111）於元豐元年（1078）的上奏，「策應」的規範調整規定過細，在呂惠卿的眼中太過死板。先前有命令，若西夏軍攻環慶，延州西的巡檢前往「策應」，若西夏軍攻鄜延，則慶州東的巡檢作「策應」。呂惠卿言：

臣竊謂敵興師動數十萬，分犯兩路，則所在皆賊，我安知其何出也？苟知我有策應之法，而欲攻鄜延，必見兵形於環慶，環慶告急，則鄜延起兵以應之；欲攻環慶，必見兵形於鄜延，鄜延告急，則環慶起兵以應之。<sup>61</sup>

以西夏軍亦實亦虛的進攻方式，宋人最後一刻才會知道西夏軍的目標地點，呂惠卿認為各路可以作「牽制」，不必硬性訂立「策應」的對象及時機，「或且依條相度牽制，不必更立互相策應之法，免致臨事拘文，以犯兵家之忌」。環慶副總管林廣（1036-1082）則有所保留，主張「策應」有其功效，使「策應」之法得以續行一段時間。<sup>62</sup>

但是，「策應」最後在神宗朝還是被廢除，改以神宗本人親自指揮協同作戰。神宗對西夏始終以攻為主，元豐四年（1081），神宗向西夏發動大軍進攻，失敗而還。<sup>63</sup>元豐五年（1082），涇原

<sup>61</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88，元豐元年三月丁酉條，頁7054-7055。

<sup>62</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288，元豐元年三月丁酉條，頁7054-7055。

<sup>63</sup> 方震華，〈將從中御的困境——軍情傳遞與北宋神宗的軍事指揮〉，《臺大歷史學報》，65（臺北，2020.6），頁1-32。

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1041-1092）主張築堡寨，步步進攻，後來放棄。<sup>64</sup>年底，宋軍在計議邊事徐禧（1035-1082）的指揮下，在鄜延路以北進行大規模的「進築」，但在永樂城遭受挫敗。<sup>65</sup>後來陝西轉運副使、權環慶經略司范純粹（1046-1117）上奏，回顧永樂圍城之時與環慶經略使曾布（1036-1107）討論，指：

永樂被圍，徐禧以下皆在圍中，勢有不利，須藉鄰援，本路經略司牒環慶等路差發兵馬。是時，臣適在環慶，親見曾布議論，以謂不奉詔旨，不敢擅遣。後至降到朝旨，果令差發，未及延州，而永樂新城既已不守。<sup>66</sup>

從范純粹的奏議可見，徐禧等人被圍困永樂城中，鄜延路向其他路通報，但是其他路在未有朝旨的情況下，不敢擅自發兵，到朝旨來到時再發兵，永樂已失陷。

范純粹藉此論「策應」的重要：

臣檢準先降戰守約束，諸路並於平日差定主兵官將，準備互相應援，或賊眾大舉聚入一路，除已差兵將外，更許逐路那兵，節次策應。昨因徐禧計議邊事，悉罷策應之法。方於其時，莫有言者，而利害得失見於今日。豈有兵困重圍，請援鄰道，尚容中覆而後可哉？<sup>67</sup>

由於缺乏元豐年間早期的史料，不清楚呂惠卿上奏之後「牽制」

<sup>64</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21，元豐四年十二月戊寅條，頁7750-7753。

<sup>65</sup>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144-146。

<sup>66</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31，元豐五年十一月戊子條，頁7972。

<sup>67</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31，元豐五年十一月戊子條，頁7972。

及「策應」的變更。從范純粹的上奏來看，「策應」之罷在於徐禧計議邊事之時，向鄰路求援還需上報中央，情報一來一往耗費時日，以致永樂之圍不得解除。後來神宗詔：「陝西逐路經略安撫使，自今應有事宜，更不令別路兵馬應援，常復須本路廣為隄備，自作枝梧，無致悞事。」<sup>68</sup>或許因為神宗意在進攻，重心不在防守，直接命令各路自行安排應急的兵力，不再需要向他路求援，不過「策應」並未從此被廢棄。

從仁宗到神宗朝的應對機制變化相當多，各路從帥臣提倡、自行應對，依戰時情況作支援，到「策應」被確立、制度化，然後被廢除，改以皇帝「中覆」，再到各路自立應急部隊。這發展一方面反映出作戰情況的複雜，另一方面反映宋人面對多變戰局時的思考，可見他們頗為困擾。

#### 四、哲宗朝的修訂與定制和後續發展

宋人在永樂城的慘痛經歷後，調整了「策應」的相關規範。後來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1032-1093）聽政，後者不甚認同新法，元祐年間（1086-1094）以防守為主，意不在進攻西夏，「策應」再次被提出。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環慶經略使范純粹再上奏應對西夏的方法。他先分析宋朝的優點，在於各路互相支持，「連城比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副」，其父范仲淹在仁宗朝已經實踐，徐禧因更改此法而失敗。以神宗最後的更動，各路自行應敵，不用「策應」是自廢武功，「自棄其所長，而使彼無復所畏也」。論到援軍的功用，「援兵之來，先聲一至，罔測薄厚，城中之人，則心安而氣振；賊兵之

---

<sup>68</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31，元豐五年十一月戊子條，頁7972。

眾，則心疑而勢搖。其不舍而去者鮮矣」，一來振奮守軍，二來動搖敵軍決心。「雖非攻圍，但賊兵並力一路，則旁為牽制，理不可闕。蓋兵家張耀聲勢，左牽右制，古所不廢。固未聞兵窮力乏，不假聲援而能獨勝者也。」即使西夏軍大軍專攻一路，援軍在旁牽制行動是不可缺的。<sup>69</sup>

同年四月，朝廷有詔「令陝西、河東逐處經略司相度，如有西賊大眾入寇，攻圍城寨，審度賊勢，須合要鄰路救援，即關牒鄰路經略司差發援兵。仰被關路分，據所關賊勢，相度合銷人馬，發遣前去」，各路在遭受入侵時可向鄰路請求支援，收到求援的路分可按情況發兵。范純粹再上奏議論，認為要等到情報到達另一路帥臣之處，才開始安排所需人馬，還要加上部隊集結的時間，這樣必定來不及支援。所以他建議平時就要選定「策應兵馬」的將副、裝備，分為兩番，多用騎兵以便行動，軍需則平時已要準備好。在敵人入侵時：

令逐路修橫烽之法，若遇賊兵侵犯，並舉橫烽傳報鄰路。其策應路分，才見橫烽，立便排促人馬，準備赴援，即未得起發。其被寇路分經略司，須審度事勢，委是賊勢重大，決非本路之力可以驅逐，方得關請鄰道。<sup>70</sup>

收到橫烽訊號後，「策應兵馬」要準備完畢，在帥司確認需要「策應」後才出發。第一番出發後，第二番前往第一番的駐紮地，預備再次「策應」。<sup>71</sup>

<sup>6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68，元祐元年閏二月己亥條，頁8885-8886。

<sup>70</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74，元祐元年四月庚寅條，頁9061-9063。

<sup>71</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74，元祐元年四月庚寅條，頁9061-9063。

元祐二年（1087）二月，有詔：

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並行策應牽制法。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除極邊屯戍兵將外，各於鄰路近便處留屯。所定策應兵將，平居無妨本路調發，遇賊眾入寇，須鄰路救援，即互相關報，仰被關路分量賊勢策應。如差定兵將發盡，即復移內郡兵將填補。鄜延路於環慶路，環慶路於鄜延、涇原路，涇原路於環慶、秦鳳路，秦鳳路於涇原、熙河路，熙河路於秦鳳路，鄜延路於河東路，河東路於鄜延路，更不豫置策應將兵，遇鄰路事宜，止令互相關報，相度出兵牽制。<sup>72</sup>

詔令的內容與范純粹的意見不甚相同，雖說是「並行策應牽制法」，基本上以「牽制」為主，各路不須要事先安排「策應」部隊，視受襲路分情況，再分撥人馬。<sup>73</sup>

元祐二年五月，西夏與唃廝囉吐蕃贊普阿里骨（1040-1096）聯合，想瓜分宋朝的熙河路。<sup>74</sup>八月，吐蕃兵敗，西夏九月才遲遲出兵，進攻涇原路。<sup>75</sup>各路宋軍立即作出「牽制」，西邊的知蘭州王文郁（?-1099）遣兵西擊西關堡，東邊的環慶經略使范純粹遣曲珍深入至西夏境內的曲六律掌，打擊部族，斬首千二百餘級，俘虜六百餘人而還。<sup>76</sup>這次是宋朝首次成功的合作「牽制」，涇

<sup>72</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395，元祐二年二月辛丑條，頁9639。

<sup>73</sup> 李燾在附注說，可見上奏後要得到回覆確實不易。參見宋·李燾撰，《長編》，卷395，元祐二年二月辛丑條，頁9639-9640。

<sup>74</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00，元祐二年五月癸丑條，頁9743-9744。

<sup>75</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05，元祐二年九月己未條，頁9866。

<sup>76</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05，元祐二年九月乙丑條，頁9869-9870；同書，卷405，元祐二年九月丙寅條，頁9871。曲六律掌的確實位置不明，范純粹的

原路受敵，左右共同行動，使西夏知道併兵入侵會使其他地方受到打擊，必須考慮到入侵的代價。

事後，朝廷似乎還沒有考慮到出兵「牽制」的賞賜問題，沒有賞賜環慶路將士的意思。范純粹上奏為曲珍及出擊將士請賞，認為將士為鄰路解圍，雖然不是防衛本路，但希望朝廷賞賜之，使今後的各路將士不分彼此。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1027-1101）亦上書，建議不論戰果，出擊的將士皆可得賞賜。<sup>77</sup>可見范氏兄弟明白各路協調作戰的重要性，若將士出擊「牽制」而無賞，出擊的意願及士氣會下降，協調作戰便可能胎死腹中。及後於元祐三年（1088）正月樞密院言：「夏賊逆命，不修職貢，繼而舉國大犯涇原，狼狽空回，諸路牽制，斬獲亦多。」<sup>78</sup>所以范純粹、范純仁的上奏對宋朝「牽制」地位的確立確實重要。

在此之後，宋朝「牽制」、「策應」的運用越來越熟練，不再消極被動。中央對「牽制」、「策應」也比以前更加重視。西夏軍攻鄯延路塞門寨，帥臣趙高（1027-1091）探知西夏軍的行動，遣將劉安、李儀作「牽制」，入西夏境內的洪州，一路殺掠族帳，多舉火光，兩天後，西夏軍撤退。宋軍再一次證明「牽制」的功效，這次朝廷封賞亦是超過標準，以示嘉許。<sup>79</sup>朝廷有詔「陝西、河東路經略司如承他路報夏賊入寇，即審詳賊勢，出兵牽制，令賊顧慮，不敢久留。仍遠斥堠，如無伏兵及有可乘之

---

上奏言「曲六律掌系橫山巢穴最盛之地，山崖深遠，道路險絕，前後漢兵未嘗窺及，其韋、宥等州一帶邊羌，每聞漢界點兵，即於此處會集，恃險自固」，應是位於西夏韋州、宥州之間。孫路指「曲律」適合進築，樞密院指其地「深在賊境」，參見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5冊，〈兵二八·備邊二〉，頁9233。

<sup>77</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07，元祐二年十二月庚辰條，頁9905-9906。

<sup>78</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08，元祐三年正月丙寅條，頁9922。

<sup>7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09，元祐三年四月庚子條，頁9976-9977。

利，方得進討，務取萬全。」<sup>80</sup>元祐六年（1091）又有類似的事件與詔令，<sup>81</sup>顯示出對「牽制」的重視。

哲宗親政後，志於「紹述」神宗之政，包括開邊。與神宗不一樣的是，哲宗親政時雖以攻為主，運用「進築」、「淺攻」打擊西夏，但同時注意防守，運用「牽制」、「策應」互相搭配。

紹聖三年（1096），鄜延路在「淺攻」中獲得若干西夏軍首領，以及起兵木契、銅記、旗鼓，因此得知西夏有入侵的可能。<sup>82</sup>九月，西夏軍在夏崇宗李乾順（1083-1139，1086-1139 在位）及國母昭簡文穆太后梁氏（?-1099）的率領下，號稱五十萬人大規模進攻鄜延路，在呂惠卿的指揮下，宋軍分為十一軍，佔據延安府外的山谷險要之處下營，並以旗號收發訊息，不輕易出戰。十一支部隊營區都打開門，又整頓河道交通，以方便各軍互相「策應」。西夏軍想攻延州但戰力不足；想進行掠奪又無處可掠；想進行決戰，但宋軍偏偏按兵不動；想南下鄜州又怕腹背受敵，最後拔寨撤退。<sup>83</sup>

<sup>80</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410，元祐三年五月丁未條，頁9986-9987。

<sup>81</sup> 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4冊，〈兵八·出師二〉，頁8773。

<sup>82</sup> 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4冊，〈兵八·出師二〉，頁8774。

<sup>83</sup> 宋·陳均編，許沛藻等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24，頁597。呂惠卿於八月偵得西夏有所行動，參見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5冊，〈兵二八·備邊二〉，頁9230-9231；清·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卷30，頁340-341。呂惠卿任鄜延路經略使的日期仍然不明，檢《宋會要輯稿》，六月起宋軍已經有頻繁的淺攻行動，所以可能是在六月已經被任命，參見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4冊，〈兵八·出師二〉，頁8774。烏延的位置及重要性，見前田正名著，楊蕤、尹燕燕譯，《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10-11世紀鄂爾多斯南緣白于山區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66-70。

鄜延戰役可說是「牽制」、「策應」設定完畢後最嚴峻的挑戰，除了環慶路遣兵「策應」以外，其餘的路分都是出兵「牽制」，如涇原路鈐轄王文振破沒煙峽，扼西夏入侵涇原的關鍵通道，熙河路鍾傳趁機進築汝遮（後賜名安西城），拱衛蘭州，環慶路對西夏軍重整再攻的偵察亦是關鍵。<sup>84</sup>這次「牽制」與「策應」對戰役的效果不如之前涇原一役大，還是能夠顯示出各路互助的重要。<sup>85</sup>從會戰的角度來看，呂惠卿的表現相當不俗，雖部隊人數不足，但分兵與西夏軍相持，諸部犄角互援，使西夏軍除

<sup>84</sup>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據民國16年（1927）上海東方學會鉛字印本影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14，紹聖三年十月條，頁302-303；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5冊，〈兵二八·備邊二〉，頁9231-9232。

<sup>85</sup> 是次戰役的時序頗為模糊，李燾將西夏入侵繫於九月，陳均繫之於十月。據《宋會要輯稿》呂惠卿八月的報告，當時已經得知西夏有入侵之意，十月八日，離西夏軍到烏延已有一個月，當時金明已破，呂惠卿請求援軍。十月十二日，西夏軍已退。在九月初，西夏軍已經接近鄜延路沿邊堡寨。如果到十月時才撤退，為何「策應」的宋軍遲遲未到？到底西夏軍於什麼時候直下延州？史無明言，可能在九月屯兵邊境，宋人未能確定西夏軍將入侵何路，因而暫時按兵不動。據紹聖二年的詔令，負責「策應」鄜延路的只有西鄰環慶路，當時也有可能是西夏的進攻目標，到西夏軍明顯以延州為目標時，環慶軍才出發。據《太平寰宇記》延州與慶州相距四百五十里，援軍即使減少休息時間，全程作強行軍，也至少需要六至七天的時間才到達，還未包括休整所需的時間。因此西夏軍可能於十月才併兵攻鄜延，在八日之內威脅延州及攻陷金明寨，然後在八至十二日之間撤退，如此一來，環慶「策應」部隊來不及參與戰鬥便合理（據樞密院於紹聖四年五月的說法，環慶路的確有派出「策應」部隊）。參見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14，紹聖三年十月條，頁302-303；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5冊，〈兵二八·備邊二〉，頁9230-9232。延州與慶州的距離參見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33，〈關西道九·慶州〉，頁707。宋軍行軍速度參見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166-171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69-1970），前集卷5，〈制度五·軍行次第〉，頁10a-10b。

了抄掠各地、攻陷金明寨以外，所得的不多，最重要的是使西夏軍不得尋求決戰，宋軍抵抗的戰力仍在。<sup>86</sup>在更大的範圍來看，此役表示當西夏軍傾國併兵一路，在其他地區必然因宋軍「牽制」而有所失，所以西夏入侵的代價繼續提升。同時，宋軍「進築」越來越頻繁，成為西夏的一大夢魘。

元符元年（1098），宋人從降者口中得到西夏計劃在今年秋天併兵攻一路，不攻城塞，但求深入，以殺掠人口為目的。大舉進攻的消息使哲宗大為憂心，知樞密院事曾布認為要嚴以戒備。<sup>87</sup>經過討論後，朝廷作出「畫一指揮」七項，大抵意思為分定各將的負責區域，阻塞西夏軍入侵的路線，「務在持重」，隨機應變，不得只把部隊用作防衛帥府。若西夏軍集中進攻一路，「策應」兵馬要張大聲勢，或邀其歸路，「牽制」方面，則要選擇要害之處進築或討蕩，使西夏軍有後顧之憂。除了戰略上的大概方向以外，也有戰術上的細則。<sup>88</sup>

十月，西夏軍以號稱三十多萬眾的部隊入侵涇原路，以平夏城為首要目標，又圍困附近的蕩羌、通峽（即沒煙前峽）、靈平、高平、九羊各堡寨。<sup>89</sup>涇原路不主動求戰，在西夏軍缺糧撤退後才追擊。巧合地，鄜延路在前一天行動，劉安、張誠率五將

---

<sup>86</sup> 曾瑞龍認為雖西夏得到戰術勝利，但是微不足道，參見 Shui-lung Tseng,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 A.D.,” p. 476.

<sup>87</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0，元符元年七月戊申條，頁11899。

<sup>88</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0，元符元年七月辛亥條，頁11901-11905。

<sup>89</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壬午條，頁11975-11976。有關平夏城的戰鬥過程，曾瑞龍作了詳細的描述及分析，參見曾瑞龍，〈從妥協退讓到領土擴張：論宋哲宗朝對夏政策的轉變及其兼容的軍事戰略〉，頁93-126。

兵力出界「淺攻」，間接地作了「牽制」行動。<sup>90</sup>環慶路、秦鳳路前往「策應」。<sup>91</sup>熙河路、河東路出界「牽制」。<sup>92</sup>在這次的戰役之中，諸路再次發揮各司其職的重要性，沿邊六路都展現了「牽制」、「策應」的功效，使西夏左右廂的族帳都受到殺掠，無論國內及出擊平夏城的西夏人都受到了打擊。樞密院在事後的報告也認為西夏軍來攻，「惟恃重兵，務在速戰」，援軍各據要害，不輕易作戰鬥，使西夏軍無利可得。<sup>93</sup>

撤退往西北方天都山的西夏軍被突襲，宋軍擒嵬名阿埋、妹勒都逋兩將及其親屬，西夏遂失天都山的地利。<sup>94</sup>在這次宋軍突然的攻勢下，西夏遭受災難式的挫敗，一則失去天險，二則證明以往西夏人控制的地點不再安全，遂向宋朝請求停戰，亦請求遼介入。宋朝此時的態度與先前元祐朝時全然不同，姿態強硬，甚至對遼的使者擺出不歡迎之姿，<sup>95</sup>重申宋朝對西夏的主從關係。<sup>96</sup>北宋在「進築」、「淺攻」、「牽制」、「策應」的搭配之下，得以發揮人數、物資、經濟上的優勢，扭轉以往挨打的局面，成為戰略上主動的一方。同時亦可見，在以「進築」的運用之下，雖然未有大範圍的擴張，但卻能步步進逼，西夏軍的進攻效果在

---

<sup>90</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3，元符元年十月戊寅條，頁11973-11974。

<sup>91</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3，元符元年十月丁亥條，頁11978；同書，卷503，元符元年十月戊子條，頁11978。

<sup>92</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壬辰條，頁11980；同書，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己亥條，頁11984。

<sup>93</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4，元符元年十一月己酉條，頁12000。

<sup>94</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庚子條，頁11985；同書，卷504，元符元年十二月壬辰條，頁12017-12018；元·脫脫等撰，《宋史》，卷350，〈郭成傳〉，頁11085。

<sup>95</sup> 宋·李燾撰，《長編》，卷507，元符二年三月丙辰條，頁12075。

<sup>96</sup> Shui-lung Tseng,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 A.D.," p. 489.

「牽制」、「策應」之下被削弱，宋軍更能在防禦戰鬥勝利之後乘時「進築」，鞏固邊面。

## 五、宋徽宗至北宋末年的發展

宋徽宗年間接續哲宗的開邊，多次向西夏發動進攻。雖然史籍散佚，以及這時不以防守為主，但仍可見「牽制」和「策應」的存續。宣和元年（1119），熙河帥劉法出塞攻統安城，由於劉法「為人所誤，置寨不得地」，宋軍被西夏軍自四處高地包圍伏擊，全軍覆沒。<sup>97</sup>此後，西夏軍自統安城南下，「賊乘間再圍震武」。<sup>98</sup>據童貫（1054-1126）的上奏：

勾集兵馬，六路出塞，深入攻討西賊，賊眾大敗，獲五千七百七十九級。修築到蕭關一帶烽臺、堡寨，招降到五千人，收到城內糧穀，將城壁並行平蕩，焚燒樓櫓舍屋盡靜。自三月十九日後來，攻圍震武軍下寨，連夜攻打。臣星夜前來熙州，差發涇原、秦鳳兩路策應軍馬，及指揮隴右同都護辛叔詹，先次摘那得力人馬，及令熙河統制何灌節次遣發近便將兵，直至震武軍張耀兵勢，及追斬獲西賊共六千餘人，前後燒毀族帳屋宇及收獲到

<sup>97</sup> 時為熙河將的翟進（?-1128）策馬四處仍找不到主將位置，原來劉法早已墮崖，被西夏軍贍軍所斬首。參見宋·王安中，《初寮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251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6，〈定功繼伐碑〉，頁7a-7b；宋·趙鼎，《忠正德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259-260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8，〈丙辰筆錄〉，頁8a-8b；宋·李暉，《皇宋十朝綱要》，卷18，宣和元年三月庚戌條，頁426。

<sup>98</sup> 宋·王安中，《初寮集》，卷6，〈定功繼伐碑〉，頁7b。

駝馬、孳畜、衣甲、器械等萬數不少。<sup>99</sup>

因劉法一部被殲滅，童貫急忙前往熙州，組織「牽制」與「策應」，命隴右同都護辛叔詹、熙河路統制何灌（1065-1126）率領隴右、熙河精兵解圍。何灌兵少，故虛張聲勢，示之以強，西夏軍撤退。蘭州兵則前往攻擊湟州以北一帶，取水波、蓋朱、樸龍三城。同時，童貫以劉仲武、种師道率兵出蕭關，直攻到鳴沙。<sup>100</sup>環慶路、鄜延路又各有出塞「牽制」，「鄜延進兵入西界三會川，斬獲數千。又奏環慶路前去西界，殺到一百餘級，降到西人百口」。<sup>101</sup>然而童貫的上奏對劉法一軍兵敗之事絕口不提。戰後宋夏和談，結束徽宗朝的對夏戰爭。

由此可見，在范純粹的力請下，「策應」再次被提出，元祐初年的朝廷似乎不甚認同，只重提「牽制」，並有所成果。至紹聖年間，「牽制」與「策應」同樣被重視，並依各路之間的地勢作設定，成為北宋後期的定制。在這發展之下，北宋一改以往各自應敵的局面，透過兩者將河東、陝西各路連接起來，再配合「進築」、「淺攻」，成為較為整體的對夏戰略。

---

<sup>99</sup> 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5冊，〈兵一四·兵捷〉，頁8891。

<sup>100</sup> 《三朝北盟會編》及《東都事略》記載种師道與劉仲武、劉延慶一同出蕭關，但是劉延慶當時為鄜延帥，為何調動較遠的鄜延兵而非較近的環慶兵？因此不取劉延慶一同出兵的說法。參見宋·李壘，《皇宋十朝綱要》，卷18，宣和元年四月丙子朔條，頁425-426；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據清苑人許涵度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60，〈靖康中帙三十五〉，頁447；宋·王稱，《東都事略》，卷128，〈附錄六〉，頁1965-1966。

<sup>101</sup>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446，〈劉韜傳〉，頁13162；同書，卷486，〈夏國下〉，頁14021；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5冊，〈兵一四·兵捷〉，頁8890-8891。

俄羅斯藏的黑水城出土文獻中，有收錄到部分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軍事文書，可反映出「策應」的細節。孫繼民等人整理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以下簡稱《文書》），為研究兩宋之際的史事帶來頗多貢獻，豐富了對宋代文書以及史事的認識。從《文書》收錄宋欽宗（1100-1161，1126-1127在位）靖康元年（1126）二月的內容，可以一探北宋末年「策應」的方式。據《文書》第36、62頁，二月十五日，鄜延路「策應環慶路軍馬」移牒第七將：「準【經】略使筓子，差統制諸將科定策應【環】慶路軍馬。自來累牒彼依數揀選，團結齊整，準備不測勾抽，便要起發去訖。數內第七將須專行遣。」當負責「策應」的部隊收到鄜延路經略使的命令，定立軍馬準備支援環慶路，便向第七將說明要做好充足準備，不時出發支援。第七將需要準備的有「人貳阡人」、「馬貳佰疋」。其原由是「契勘今來探報緊急，西賊大兵待於環慶路出沒，候到，請詳□立便將前項科定人馬，火急整結成隊伍，及軍器什物攢攢足□，為待敵之計。」有探報指不少西夏軍在環慶路附近出沒，所以指示鄜延路的「策應」部隊作好準備。<sup>102</sup>同月十九日，鄜延路收到環慶路的消息，指西夏軍進攻環慶路，「有西賊大兵侵犯漢界，攻圍定邊軍亦綏遠寨、觀化城、朱臺寨等處」。二十三日，守烽人收到環慶路傳來的橫烽訊號，代表環慶路向鄜延路通報敵情，傳來的訊號有「賊火叁把」。二十四日，「又舉到賊煙叁筒，擺黃旗一口」，後又有「賊煙肆筒，黃旗一口」，代表西夏軍可能有五千人以上。<sup>103</sup>二十九日，

<sup>102</sup> 《文書》第36頁為第62頁之底稿，【】內字為筆者據文意推測填上者，空白□為孫繼民無法推斷之字。參見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69-70、119-120。

<sup>103</sup> 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頁18-19；陳瑞青，〈兩宋之際陝西軍政問題研究——以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

第七將再次被提醒要準備充足，將部隊「團結」完畢，「無致有違誤」。<sup>104</sup>另有一份殘缺文書記載「將科定策應人馬，火急□□選堪出戰人馬團成隊件，及隨軍須之物，一一排辦數足，常為軍行□□□□。至急勾抽，便要起發□」，應是鄜延路要第七將預備隨時出發的命令。<sup>105</sup>

從上所述，可知當發現敵人行蹤時，各路便會以橫烽進行通報，可能會被攻擊的環慶路聯絡作「策應」的鄜延路，鄜延路通知駐紮在邊疆堡寨上的「策應環慶路軍馬」，後者再聯絡各「將」糾集所需人馬，從其職權範圍中選出士卒，「團結」成作戰隊伍，籌集所需物資。在鄜延路經略司決定出兵「策應」時便出發。從《文書》中反映的機制，與范純粹的上奏、宋哲宗年間的詔令並無太大差別，平時已經有「策應」部隊屯於邊境，只是似乎沒有分成兩番而已。<sup>106</sup>最後，雖然《文書》中沒有關於「牽制」的記載，但是「牽制」與「策應」兩種對外戰爭的應對行動都保留著。<sup>107</sup>

---

軍政文書》為中心的考察》（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8），頁36-37。

<sup>104</sup> 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頁201-202。

<sup>105</sup> 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頁203。

<sup>106</sup> 孫繼民及陳瑞青以《文書》為本，認為宋朝在宣和七年正月，為回應西夏可能的進攻，組建稱為「策應環慶路軍馬」的機構，然後西夏軍在靖康元年果然進攻。換言之，是認為策應軍馬是北宋末年臨時成立的機構。參見陳瑞青，〈兩宋之際陝西軍政問題研究——以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為中心的考察〉，頁34-35、39-40、49。不過若不只從《文書》，而輔以其他文獻的脈絡來看，策應軍馬其實早有出現。

<sup>107</sup> 宋人馬擴（?-1152）撰《茅齋自敘》記童貫在金人進攻河北前，曾要求「太原、真定、中山、河間、燕山府路，令分定策應、牽制路分」，參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3，〈政宣上帙二十三〉，頁167。

## 六、結語

從宋仁宗時的零星建議，到英宗、神宗時朝廷多變的規範，到宋哲宗時正式確立為對夏戰爭的行動機制，「牽制」與「策應」實際上發揮了功效。以往西夏集中攻擊宋朝一路，後者難以支撐，在宋朝各路運用「牽制」與「策應」後，每當西夏進攻，一則出征的軍隊會面對前來「策應」的宋朝援軍，二則國內會受到從其他方向來的宋軍攻擊，所以西夏不能發揮相對、局部的兵力優勢，而宋朝卻可以發揮其絕對的兵力優勢。宋人運用「牽制」、「策應」，可同時打擊入侵的西夏軍以及西夏國內。

不過北宋的「牽制」與「策應」並非沒有缺點，這些行動的機制只適合於橫向分佈且連續的地緣空間，例如宋夏的邊疆，其設定只能應付正面來侵方向，一旦敵方從側面或後方前來，便難以奏效。此外這些行動機制必須要被中樞「大腦」所認可，倚據邊疆形勢作宏觀的設定，給予各路的經略安撫使有一定的權力，方可靈活運用。北宋末年女真人南下時，從陝西東側的河東路前來，自東往西進攻陝西，這時宋軍對金軍的攻勢便顯得被動，也不見各路互相支援的行動。在中央政府崩潰南下之時，陝西各路不能自行變更出新的作戰機制，只有各自為戰的情形，再次成為被動挨打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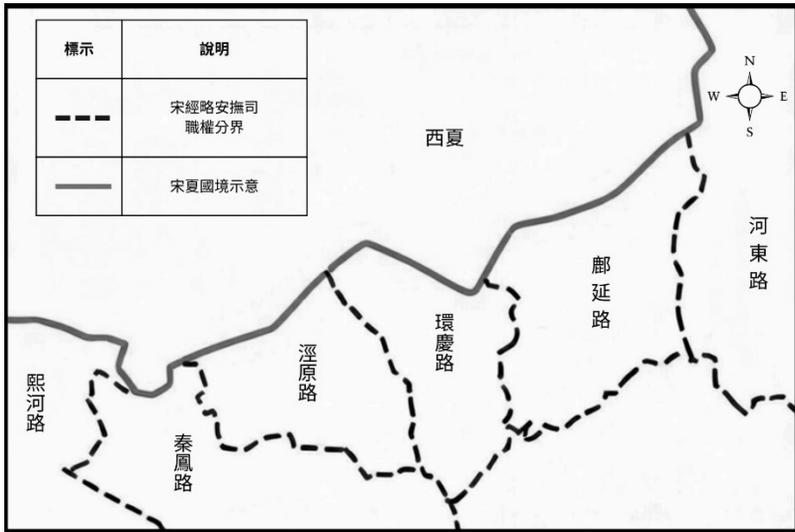


圖 1 北宋路分及宋夏國境示意圖

說明：圖中線條僅為示意，並非實際之分界線。

資料來源：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6 冊（宋·遼·金時期）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北宋·永興軍路〉，頁 18-19；同書，〈北宋·秦鳳路〉，頁 20-21；同書，〈遼·北宋時期·西夏〉，頁 36-37，簡化改繪。

## 引用書目

### 一、古籍文獻

-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178冊，據上海涵芬樓影印春岑閣舊鈔本重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宋·王安中，《初寮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251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 宋·王稱，《東都事略》，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第4種，景印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刊本，臺北：中央圖書館，1991。
-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宋·李暉，《皇宋十朝綱要》，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據民國16年（1927）上海東方學會鉛字印本影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8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據清苑人許涵度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宋·陳均編，許沛藻等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北京：

中華書局，2006。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 166-17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69-1970。

宋·楊仲良編，《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據《宛委別藏》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宋·趙鼎，《忠正德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259-260 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二、近人專書

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吳天墀，《西夏史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初版於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前田正名著，楊蕤、尹燕燕譯，《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

10-11 世紀鄂爾多斯南緣白于山區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曾瑞龍，《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0。

程龍，《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6 冊（宋·遼·金時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 三、近人論文

方震華，〈將從中御的困境—軍情傳遞與北宋神宗的軍事指揮〉，《臺大歷史學報》，65，臺北，2020.6，頁 1-32。

伊藤一馬，田由甲譯，〈北宋陝西地區形勢與將兵制的建立〉，收入鄧小南主編，《過程·空間：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415-442。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3，臺北，1990.9，頁 693-760。

張多勇，〈西夏金湯、白豹古城考察研究〉，收入劉文戈、馬嘯主編，《范仲淹與慶陽：紀念范仲淹知慶州 970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頁 332-342。

陳瑞青，〈兩宋之際陝西軍政問題研究—以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為中心的考察〉，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

曾瑞龍，〈從妥協退讓到領土擴張：論宋哲宗朝對夏政策的轉變及其兼容的軍事戰略〉，《臺大歷史學報》，28，臺北，2001.12，頁 93-126。

曾瑞龍，〈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收入氏著，《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36-61。

雷家聖，〈北宋禁軍編制的演變與「置將法」的實施〉，《史學彙刊》，34，臺北，2015.12，頁 99-124。

羅球慶，〈北宋兵制研究〉，《新亞學報》，3：1，香港，1957.8，頁 169-270。

羅球慶，〈宋夏戰爭中的蕃兵與堡寨〉，《崇基學報》，6：2，香港，1967.5，頁 223-243。

Lorge, Peter. "The Great Ditch of China and the Song-Liao Border." *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 War, Bord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 edited by Don J. Wyatt, pp. 59-7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McGrath, Michael C.. "Military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1126)." PhD thesis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2.

Smith, Paul Jakob. "A Crisis in the Literati State: The Sino-Tangut War and the Qingli-Era Reforms of Fan Zhongyan, 1040-1045."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5, January, 2015, pp. 59-137.

Tseng, Shui-lung.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 A.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from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7.

#### 四、工具書

Simpson, J. A., Edmund S. C. Weiner ed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inning” and “Reinforcing”: Northern Song’s Mechanism of Defense against Xixia

Wong, Tsz-yin \*

##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frontier defense mechanism of Northern Song China, which aimed to counter the Tangut Xixia, by focusing on the concepts of “pinning” (qianzhi) and “reinforcing” (ceying). The Song struggled with handling raids and invasions by Xixia since the reign of Renzong (1022-1063). Lacking consensus at court, proposals for frontier circuits to mutually reinforce one another were not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After the costly war that failed to annex Xixia in the reign of Shenzong (1067-1085), “pinning” and “reinforcing” were adopted by the court. During Zhezong’s reign (1085-1100), recognising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rontier topography, the court established a defense mechanism that emphasized mutual reinforcement among neighbor circuits and counter-invasions in response to Xixia incursions. This defense mechanism, according to unearthed documents,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the Shaanxi region until it collapsed under Jurchen Jin forces during the destruction of Northern Song.

**Keywords:** Northern Song, Pinning (qianzhi), Reinforcing (ceying), Xixia, Frontier defense

---

\* M.A.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